

摘要 谢英俊近年来无论在台湾、还是中国内地及海外的实践项目，都获得了极大的反响，并获奖和展览无数。一系列灾后重建工作的成绩使谢英俊拥有“灾难建筑师”、“人道主义建筑师”、“公民建筑师”等美誉，但这仅是媚俗的赞誉。在脉络性的理解架构里，检视建筑实践与欲解决问题的关系性构成。亦即回答谢英俊建筑意识形态召唤了什么？而建筑实践又回应了什么？包含从理论上分析其超越现代性与一般灾后重建的不同，最终将谢英俊的建筑实践归结为“社会性建筑”。

关键词 灾后重建 社会性建筑 谢英俊

ABSTRACT The architectural practice of Hsieh Ying-chun has received great response in recent years. The outcomes of a series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given Hsieh honorable titles of “Post-Disaster Architect”, “Humanitarian Architect”, “Social Architect”, and “Citizen Architect”. However these are only kitsch praise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what Hsieh’s architectural ideology has recalled, and what his architecture practice has responded to. This includes theoretical reviews on his beyond-modernity approach and how it is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s. I finally conclude with the thesis of “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 supporting a holistic view on Hsieh Ying-chun’s architectural practice.

KEY WORDS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 Hsieh Ying-chun

中图分类号 TU-09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 (2014) 01-0004-06

黄孙权 Huang Sunquan

三种脉络，三个方法

——谢英俊建筑的社会性

Three Contexts, Three Methods: The Sociality of Hsieh Ying-chun's Architecture

“一切真正为人栖居的地方，都有家这个观念的本质。记忆和想象彼此相关，相互深化。在价值层面，它们一起构成了记忆和意象的共同体。因此，房舍不仅是个人的经验，而且是叙事里的一条线索，或是在你自己叙说的故事里。透过梦想，我们生活寓居场所共同穿透且继续了先前岁月的珍宝。因此，房舍是整合人类思想记忆和梦想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没有了它，人只不过是离散的。”^[1]

“我住进来了，但灵魂还没进来”（玛家农场好茶村邱爸）。

“住在那种灰白精舍的房子里，连生小孩的欲望都没有”（曾参与玛家设计的人员对长台百合园区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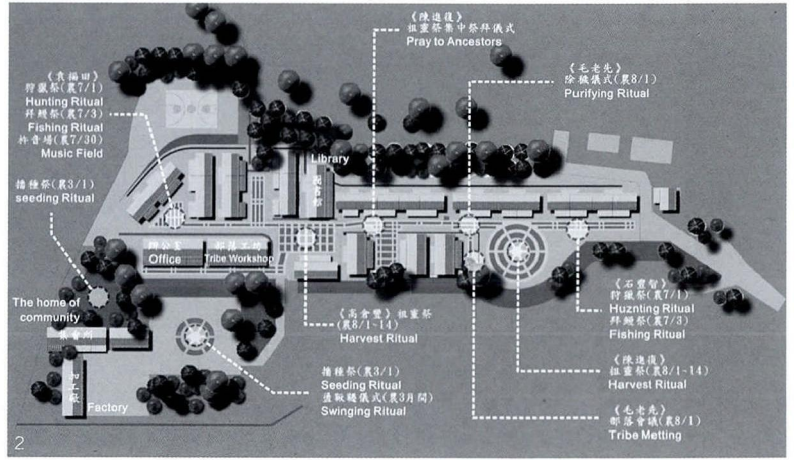
谢英俊的建筑工作这几年无论在台湾，还是中国大陆及海外都获得极大反响，在台湾9·21地震后邵族重建工作的成功使他拥有“灾难建筑师”、“人道主义建筑师”、“民众参与”等美誉，然而这些赞誉误读了其建筑工作的含意。

论述谢英俊的建筑是困难的。首先我们要评断其建筑工作逻辑构成及实践方法，其次我们要将之放在一个脉络性的理解架构中；最后，我们还要认真对待其建筑实践与欲解决问题的关系性构成。亦即需要对谢英俊建筑意识形态所召唤的内容作政治分析。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社会性建筑（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较合适的说法，分析谢英俊在台湾展开的一系列工作，也必须从此角度理解，这不仅是建筑计划，而且是一个空间生

作者单位：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



1 9·21地震后邵族重建部落



2 邵族社区配置

产计划。

谢英俊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灾区的问题不是解决灾后的问题，而是解决过去的积累。”那台湾过去的问题为何？须回到台湾特殊的脉络下理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其支持自身的空间。”^[2]每一个空间都弥漫着社会关系。对谢英俊工作的批评与赞赏都必须从历史及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并将之联结到空间生产中¹。

一 第一种脉络：发展取向国家的创伤

9·21大地震、莫拉克8·8风灾等与其说是天灾，不如理解为自然对台湾发展国家机器长期以来失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次性报复，是对自然环境的剥削、区域规划的失策，以及忽略社会成本的索偿。此灾难严重破坏了南投地区槟榔的种植；在中央山脉两侧，特别是谷关一带，是同一休闲旅游形式大量复制导致水土稳定系统破坏的报应；在其他地区，则是对建筑产业廉价快速生产，以及非正式营建系统的警告，就空间法规而言，是不守台湾土地管理最基本法令《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的后果。灾难，只是被自然揭露这些应该要被算进去的历史欠账而已。

莫拉克8·8风灾，是国土计划的失败。一方面因南水北引，由越域引水的水坝计划造成；另一方面是农业土地的荒废破坏了水资源的供给平衡，以及因各种开发计划（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休闲观光园区）企图以空间作为生产资料的二次资本循环所

造成的^[3]。空间本身成为生产数据，而非载体，通过转换空间的使用目的，以空间修补（space fix）的方式解决内部循环的困滞，如农转工，农转住，工转住，工转商，住转商等等，这些计划仅用“使用目的变更”便可在无需具体的劳力与资金投入前，带动资本运转，利用土地变更后的竞标价值带动土地金融商品成长，以及背后赖以生、以案养案的建筑营造业。在土地还未变成真正商品之前，就已卖出多次。于是，资本通过空间的差异制造了自身的成长。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生产得以幸存^[4]，这种创伤对于民众来说苦不堪言。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家园的倾颓；对于农人与经营自然资源的人（如谷关温泉与高雄宝来温泉）来说是失去生产工具；对于原住民则是历史、家园与生产工具的一次性毁坏。

人民面对巨变后的震惊，往往很容易接受“白纸般的开始”与妥协的方案。这是台湾救灾建筑工作的起点。无论是世界展望会、红十字会或者慈济功德会，不同的NGO组织、政府，以及每个建筑团队都会带着不同的建筑方案介入安置计划，居民多半无奈地接受“安排”，在安排下，抱怨与不满都是针对安排的操作，而不是反对安排的计划。

资本通过空间差异得以快速累积循环，而此差异导致的后果不公平地由弱势群体承担，原住民的部落与生存空间则是受害最严重者。在承受灾难的过程中，“中继”的房舍计划莫名成为永居屋，而临时农场变成家乡，新的永久屋的获取必须以原有房舍交换而来，新家乡失去了旧家园所有的一切，包括工作、教育与社会网络。对于失去猎场与传统

领域的原住民而言，这不仅是安置（relocate），而是重新寓所/迁村（rehabilitation）的问题。对原住民来说，由于发展取向国家机器造成灾难，这些创伤将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日后的安置问题与谢英俊的建筑工作上。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的脉络之一。

二 第二种脉络：都市过程与意识都市化

从经济的角度看来，大台北泛指以台北市金融中心为主的区域分工，包含新竹科学园区、桃园仓储与工业区、台北县提供的住宅与集体消费服务，甚至中南部的农产运输。

1949年战败的国民党来台，为了满足当时庞大的军人眷属的住宅需求，除了以娱乐捐与慈善募款作为经费来源加紧兴建眷村外，政府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容许违章建筑，以维系统治权的正当性。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波城乡移民后，由于各式的姻亲关系，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过本地人，形成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个由“非台北人”为多数所组成的城市。

之后，区域分工造就更明显的空间区隔。上世纪70~80年代，城市本身作为经济建设的发动机，亦即靠着贩卖地皮带动本土建设相关产业，形成一个内需导向的经济成长。此时为台北房地产的黄金期，造就了第一波台湾经济起飞，同时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开始。空间成为交换价值，至此没有回头路，它支撑台湾的成长也毁灭了台湾的环境与人文。台北的发展正是这一巨变的发动机，空间生



3 完工后的玛家农场

产也符合此时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分工逐渐完善。如仿照英国花园之城规划的“永和”成为台北卧房城，供给大量于台北工作但住不起房的人们；新庄、三重、五股成为贩厝的提供地，满足低廉的住宅需求，同时这些区域又被城镇工业化与卫星化；芦洲、树林与泰山则是第二外缘的卧房城与工业区，并作为桃园新竹地区发展的通道，北投与新店则由观光产业与公务人员分食。淡水作为台北的前庭，宜兰、礁溪、石碇、深坑则是台北的后院。至此现代意义的台北方才诞生。台北是整个台湾经济资本累积过程的果实。

80年代末期，台北轴线由西向东扩张。翻转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也不是旧城重建，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政府抗争或支付高额赔偿费，而最好的前沿先锋，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资本的，都是在“大西部”。历史上的台北市，出现过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一是违建化，因政权所提供之集体消费不足，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谋生活，呈现出空间的穷困但丰盛亲密的社会网络；另一边则是曼哈顿化，资本带动土地开发并象征性地形塑市民举目可及的全球景观，呈现空间的盈余，社会网络的虚空。都市过程中反应的不只是石头与金钱、人口移动的游戏。在文化上，意识的都市化

(urbanized consciousness) 成为文明与现代性意识的标志，这包含对现代性房舍形式与物质的想象^[5]。

正是台北特殊的都市过程，形成了交叉却矛盾的流动过程。退休的中产阶级流行到农村购地盖起农舍，“万亩良田种农舍”²不仅是宜兰罗东小区大学的一部影像学习成品，其更敏锐地指出罗东成为大台北有钱人的后花园。在“农地开放买卖”的政策下，台湾最优良的农地碎裂化了，同时水泥化了，而农民知道一旦水田挖下地基，盖上水泥，良田就一去不复返了。“农地开放买卖”与“富丽农村”计划是同时产生的。知识份子下乡搞有机农业成为环保先锋，几代务农的农民则休耕或卖掉土地，子弟向城市涌进。意识都市化是都市过程中的产物，是都市生活作为一种“未曾谋面”的都市经验而普遍化的成果。作为意识形态主体化的过程，既有其物质条件，也有被召唤的。此种意识都市化包含人们对日常生活及文明的渴求，如现代楼房、房舍空间形式与材料，便利的日常生活等等。这是理解谢英俊工作的第二种重要脉络。

三 第三种脉络：非正式营造系统

在台湾50~60年代，“贩厝”是大都市周

边，以及接邻乡镇主要的建筑形式，以非正式的营造方式与材料，延续了传统生活中自己动手增修改建的习惯，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动手修房子，视需要与现金“持续”改动。无须建筑师，只由熟识的工匠与亲友一起盖房。这原本在乡村是很常见的，每个人都会盖房子，也参与其中，但在都市过程中逐渐被剥夺，却又在发展中国家都市延迟的现代性下被延续，这一现象源于专业教育、执照与认证系统跟不上都市人口住宅需求的快速增加。非正式营造系统都是发展历史中主要空间生产模式，在政府无法提供足够住宅的情况下，容许民间的营建系统，台湾民众不得不自己动手修建，这一修修补补的过程是对“建筑专业”匮乏且昂贵的因应，用谢英俊的说法，这是全世界长期以来70%的人解决自己居住问题的方法。

到了1995年，因房价飙升，土地与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阻碍了都市更新（空间再生产）之现代地景想象与土地金融资本再发展，台湾政府才严格回溯违建法规，以确保推动资本生产便利无阻。每个地方政府处理违建的法规并不一致，以台北市为例，1946年都市计划公布前，老旧房屋的拆迁会给予土地与房舍、迁移的补偿；1994年之前为既存违建，拆迁时只赔偿地上物与迁移补

助；1995年1月1日之后，新违建只能获得迁移补偿。但公共空间的征收期效只有25年，一旦超过年限政府将依法无据征收。在90年代初，都市计划的历史债务爆发，使得都市政权需以魄力征收，推土机扫荡了违建，也引发了1997年台湾都市史上第一个都市社会运动——“反对市府推土机联盟”^[6]。非正式营造的地景，14、15号公园预定地、鸡南山、鳧舂剥皮寮、宝藏岩等，有的被清理成城中公园，有的经过强烈的都市社会运动抗争，暂时成为“文化地景”保留地。

与此同时，城里的建筑仍有许多违建，从阳台外推到顶楼加盖、占据防火巷与夹层屋等，都是非正式营造系统长期铭刻于空间的结果。这成为台湾都市非常独特的景观，由人民在空间表征控制下之城市写作系列^[7]，一个关于日常生活住所的变通（making-do）战术。

非正式营造系统另一个重要的面向，则是培育出许多准专业的建筑工人。在台湾60~70年代经济起飞之际，许多底层工人与城乡移民、原住民进城寻求生机，最先投入的便是城市的营建工作（后来由外劳取代），这在后来谢英俊的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 谢英俊的建筑工作：社会性建筑

1 第一种方法：开放系统

建筑能够做什么？这是自现代主义建筑以来问过无数次的问题。如果现代主义建筑在面对工业化大量人口聚集都市之住宅需求时，提出的对策是模块化和高层化，拿掉多余矫饰以白的立方体来解

决，那么空间生产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模块化事业。但事实远较此复杂，这个模块化事业，还真吸引了不少优秀专业者的关注，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倡导的支撑体系与填充体系。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包豪斯初创时期之后，认为建筑应当向工业学习，提出机械化大量生产建筑构件和预制装配的建筑方法，他甚至还提出一整套关于房屋设计标准化和预制装配的理论和办法⁸。在70年代工业化模块没落之前，日本与前苏联都有大批的预铸屋（即预制装配房）。当然，现在预铸模块系统在6天之内完成一座宾馆也不是新闻了。

包豪斯开启的现代建筑传统隐含着“社会工程”的梦想，但可惜仅以风格的方式拓展到真实世界，形式不能成为世界新兴都市的解药，这是意大利威尼斯学派的建筑史学家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所批评的“资产阶级道德的救赎”的彻底失败。那些为了解决都市人口大量聚集问题的理论，除了能挽救自身的美学外别无他用，在《建筑与乌托邦》一书中他批评柯布西耶，认为资本主义系统吸收了现代建筑之道德救赎的美学成为自身再生产的方法，并彻底地改变了生产关系，以至于为了解决都市住宅问题的乌托邦计划，最终变成计划本身的乌托邦，为了改变社会工程的意识形态，只剩下了计划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从“乌托邦计划”变成“计划的乌托邦”的沦丧过程^[9]。

“灾区的问题不是解决灾后的问题，而是解决过去的积累。”谢英俊这句话可以让我们将其实践联系上述的三个台湾空间的特殊脉络，亦即解决台湾空间生产的现代性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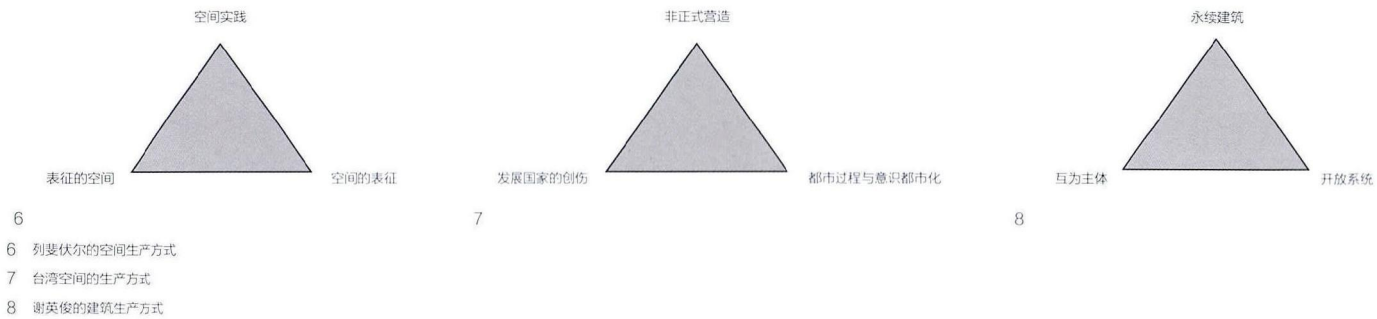
谢英俊在屏東麟络的工作室旁，有个生产轻钢架的工厂，铁皮屋顶下最简单的车床每年能够生产2000栋房子需要的轻钢材。工厂的劳工许多是受灾原住民，他们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或“社会就业多元方案”进来工作，由于之前有盖房的经验，现在可帮其他灾民盖房子，体现了台湾传统原住民部落互助盖屋的传统。麟络工厂生产的轻钢材，就是谢英俊建筑中的开放系统、简化构法的核心工具。他认为建筑的工作不是完成建筑物，而是提供一个开放性架构，是一个不可取代，但作为最多的框架，因为主梁是一般常民无法处理的工作，选择轻钢架是因其抗震性佳，在没有机械设备的环境下移动容易，靠人力搬移组合。

灾难让谢英俊的工作有了新的机遇。9·21后的邵族不仅面临家屋的倾倒，而且导致部落居民一无所有。邵族人民短时间内需要住房，在没水没电、救援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营建方案要成功，必须是一个花钱少，甚至可以拿自己薪水盖房子，并且民众可共同参与的生产体系。而这个参与工作，简单到只要会锁螺丝，组装就可以盖房子。房子零件尽量符合一般建材市场规格标准，可自行维修更替。原住民在工程经验上并非弱势，他们自身的经验、紧急状况的处理、穷困的条件、部落原有的社会网络与民族议会共议制度，加上谢英俊提供快速（工期短）、便宜（一般水泥房屋造价的六成）、可参与的自立造屋计划（劳力投入、互相帮助、成立工班，甚至可以协助其他部落重建），使邵族在短期内得以重建，而此次经验建立了谢英俊建筑计划的实践哲学基础。以此模式，因地制宜，在不同

4 邻近由慈济建造的长治圆区水泥房则死气沉沉

5 玛家农场完工后原住民自己动手增添柱式花样





6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方式
7 台湾空间的生产方式
8 谢英俊的建筑生产方式

的受灾地点展开一系列的项目（图1-3）。

谢英俊的开放系统及简化架构与一般模块化有些根本的不同。这是未完成的建筑计划，或说核心建筑。建筑师做的最少（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主体则是无限扩大），而居民参与最大（现代主义工业化的房子是作为消费而非生产的），基地与主梁由工作室设计完成，墙面、装饰可由居民自行解决，只要留下的公共空间够大，这房子就会建出来。

开放系统确保了低成本与劳动参与性。轻钢骨架犹如房子的脊梁，其余通过标准化结构与组件，使部落居民都可参与营造过程。在8·8风灾过后，玛佳农场在短短的四个月中要建造438套房，除了动员当地居民，还有一部分必须找外面的师傅来做，而这些师傅正是来自之前参与原乡灾后重建的工班，等于部落之间的相互协助，原本没有信心盖房子的人了解盖房子是如此简单，容易参与。谢英俊曾在北京尤伦斯美术馆展示了一个视频，一对夫妇做了20余套的房子，都是采用简单的螺栓，一栋130 m²的房子，两人大概费时3天即可完成，简化的工序与低廉的成本是其优点。这样部落的人也可参与房屋营造，犹如山上的房子一样由大家一起建造，同时还解决了就业问题。

开放性系统的第二个特征是可变性。谢英俊的工作常常从示范屋开始，说服族人自己盖房，劳动力参与先于设计意愿，完成主结构后，劳动力从自我学习转到自我生产，由此保障了日后维修与改变的可能，其建筑计划的未完成性也保障了他者自主参与。

从台湾9·21大地震以来，谢英俊与其第三建筑工作室完成了上百个项目，从台湾到大陆，从阿里山到西藏，项目不尽相同。以谢英俊建筑师自己总结这十几年来的经验说法，他的建筑系统有三个主要部分：持续性建筑涉及了永续、环保、材料回收等概念，开放系统架构确保了低成本与劳动参与性，而互为主体是居民参与开放性系统之后的结果。然而最核心的部分乃是开放性架构，或可理解

是现代主义工业化模型最轻量化、简约化、控制最小参与最大的版本，而开放性架构也确保了地方性的生产并非仅于房子的生产。由此，开放系统可成为在创伤时期藉由劳力的参与、群体的支持，变成灾民重建寓所的力量。谢英俊在TED的演讲⁴中提到海地居民的营造方式，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拥有自己的营造方式与经验，只要不将其视为弱者，他们会用自己最经济的方式完成，而开放系统就是保证这种力量出现的方式。

2 第二个方法：永续建筑

地方性是需长期积累的。人文地理学强调地方感是人类居住经验的整体感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来说，地方性则是一种感觉结构^[9]，是一种长期变动但逐渐累积成一个整体生活样貌的感觉，亚伦·普瑞德（Allen Pred）对此更进一步放在其生成（becoming）过程中来谈论地方感^[10]，都市研究中探究地方性的取向则以地方性之转变涉及了新旧地方感的递进竞争，以及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之感觉结构作用为主。

在台湾都市过程中，地方性的转变由不同的力量与政策所制订，剧变灾难后之重建为最暴力的方式，艺术介入小区就显得温驯可爱，绿化/高级化政策则可作为空间生产条件再生产的工具。各种重建方式，因其所属社团/建筑专业者之意识形态所进行文化干预程度皆有不同。同时，地方性与资本累积、现代化的营造体系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都会型小区价值之都市意识化的文明生活，以及都市政权分配利益均与选择创造都市经济的政策息息相关。

对于台湾原住民来说，地方性/经过都市过程打造理论意义并不能确切涵盖原住民居所的意义。原住民的生活空间是部落整体生命之所在，包含了生活与工作、历史与现在、家与部落的整体，而非石头的群聚。讨论灾后重建的地方性就不能简单从都市过程中锻造的地方性理论去理解。灾后重建面临的也不只是家屋重建，而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丧失，部落的历史（祖灵）与石头的历史（传统家屋）之形式消失，以及维系日常生活与再生生产领域的重建，如大人工作问题、小孩求学问题、信仰安排，以及村落空间的形式与分配等。部落居民失去了传统领域，意味着失去猎地，工作与住所分离，失去传统家屋意味着祖灵寓所必须迁离与重建，那些历史中的山河将不再被孩子们认识，意味着他们的下一代将永远平地化而失去自身的历史。

谢英俊的建筑思想中，“中继”的概念一直是令人误解的哲学。“中继”意味着土地不属于个人，人无法永远拥有土地，人民总是智慧地暂居于土地之上。这是灾后成为最能说服灾民，但在面临永久屋的选择时最不能被认同的论述。谢英俊也将永续建筑（sustainable construction）用环保、因地制宜的概念来扩充其“中继”概念。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永续建筑的定义，包含了环境、经济与社会文化的永续。谢英俊将其对应到自身实践的工作，建立一套永续建筑的论述：环境对应着绿色建筑，每个人都可参与操作的营造系统；经济则指非依赖性、非货币交换性的营造过程；而社会文化指的是保持小区自主与多样化。

谢英俊的工作，必须面对大多数都市人工作与住所的分离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对进步文明之意识都市化的反扑。无论身居城市或乡村，原乡的居民对于现代房舍已有固定的想象，传统住屋的现代化更迭也很难维持传统的营造方式。尽管如此，原住民部落的寓所远比汉人的家复杂许多，汉人的家已被格式化，家与工作、祖先祭祀是分开空间，这些空间通过现代性的安排重组，将个体性从社群与历史文化中拉出。然而原住民的家，则是安置社群与历史的核心。在此双重的文化需求下，较能解释谢英俊在玛家农场的工作中所遭受的批评⁵。对原住民来说，部分人觉得可以自己盖房子，部分人不愿离开原乡，如果都不行，就要求自己的房子起码坚固，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微薄希望。

永续建筑是否能够与都市过程产生的异化环

境,以及现代住所意识形态有效的对话,现今仍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开放系统确保了低成本与劳动参与性,而互为主体是居民参与了开放性系统之后的结果,建筑师主体性会在永续建筑的工作中展开,是建筑的政治计划与历史性(historicity)计划。

3 第三个方法:互为主体

在阿里山来吉部落的会议中,谢英俊与部落人协商,说服他们自己争取住房的形式与空间。他采取的策略是建筑师提供协助,基本房舍结构由专业者完成,但是完成房舍、房型选择、住房面积、公共空间,需要他们努力与市政府协商要求更大的空间。建筑师能做的有限,就算帮居民要到更大的空间与土地,也未必是他们所要的,或这样不能让他们自己干,而自己干是空间生产很重要的方式。

通常我们论及社会建筑时,指的是服务弱势,或与居民站在一起的计划,亦或更进一步地协力造屋。在台湾90年代后,特别是“小区总体营造”开始之后,小区参与成为流行的建筑设计方式。这个原本反抗由上而下粗暴的空间生产方式,变成另一种主流政治论述公共工程的绑定项目。

社会建筑在台湾的实践上成为规划概念的参与,如规划说明会、专家咨询会议、小区说明会等等;或是设计参与方式,由建筑师与居民合作,在具体的空间尺寸上讨论需求、形式、功能。社会建筑缩减成小区参与、或制度内的小区建筑师服务邻里的工作。

然而,社会建筑在实际的推动中,与居民矛盾的多,和谐的少。一个有良心的设计师,会在他的工作中平衡团体的权利。如果社会建筑仍是认同强者(多数)的价值,那就失去所有的意义。换句话说,唯有当社会建筑是一个起义的计划(insurgent planning),让隐藏的声音出现,让弱势者现身,让少数者的权利被看到,我们才有讨论的必要,否则所有的建筑都是社会力的结果,社会建筑只是多了个意识形态包装的侈译。

我们可以通过谢英俊的自我描述,来重新检验他所谓互为主体的概念到底如何?如谢英俊常说:“如果不能沟通,就不沟通了。”或举“筑室道旁,三年不成”的例子,大马路上骑马的人经过会觉得房子太矮,走在路上的则会觉得房子太高,左邻觉得丑,右邻觉得漂亮,这样下去,没有一栋广纳民意的房子能盖出。

这说明了谢英俊互为主体的意思,建筑师并非没有主体,而是要体认自己与他者的不同,是维根斯坦意义上“绝对的他者”而非唯我论的他者、弱化的他者。不同就是不同,不是聆听,不是坐下来讨论,而是在共同的时空、说服/斗争的过程中,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完成主体的建构,完成建筑的生产

过程,如同邵族的多部合音,不管你的音调如何,都可找到融入的方式。这个动态生产的过程,恰好是互为主体的生产过程,而非建筑师的方法。

德国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觉得马克思谈的劳力过于简单,只是作为劳动生产的劳力。她认为必须细分人的活动生命:劳动(体能劳动从大自然中产出消费和维持生命的物质)、制造(创造、利用素材营构持久事物的构造)与行动(通过言行开展,维持历史与政治的世界)。制造(poiein)与实践(phronesis)是不同的。如此,从制造的空间来看,它发生在制造者和制造素材间,制造者不必跟他人产生或建立关系,其存在处境具有独特性。行动具有彰显性,行动者同时是一位言谈者,使行动或实践有别于制造或创造。在这样的说法里,行动彰显公共空间^[11]。于是,在一个有他者在场,表达自己的行动,有其政治实践之处,就是公共空间。谢英俊的建筑工作正是在每个人的行动,政治实践的劳动力过程中,产生互为主体的。这种互为主体从交流开始,如柄谷行人所指的,“愈是认为建筑是设计理念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愈远。”而建筑是交流的,这无庸置疑,它是与没有共有规则之间的交流(图4,5)^[12]。

五 结论:空间的生产

本文用“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而非“social architecture”,是为了强调谢英俊工作中并非一般所认识的“社会建筑”的取向,特别是人道主义取向的理解。建筑可以服务人民,但不能仅以服务人民来断定建筑之工作。按照列斐伏尔的看法,空间的生产是三元辩证与斗争的结果。我们可套用列斐伏尔的方式,理解谢英俊工作中的空间生产方式(图6-8)。

谢英俊工作的重要性,是他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刻,通过建筑工作(无论有无意识)以实践“黏合”了笔者所说的三个脉络——发展取向国家的创伤、都市过程与意识都市化,以及非正式营造系统,其工作在解决问题中有清楚的“分工与交流”(马克思语)的关系性构成。这并不是说,他确实地回答了问题,而是他在当下的条件中,企图通过建筑去响应他所感受的部分。这是他建筑工作最重要的当代性,最具有意义的社会性。

最后,建筑师的工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再好的空间方案也只能作为减缓发展国家机器带来的创伤。传统住屋的形式是否还能继续?住屋营造过程的礼仪与工艺传统如何(或如何不需)维系?关于灾难的原因,后灾难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如何平等?这些问题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性建筑提出其看法与对策。建筑师不能凭着对结构的自信就放弃追寻

一种社会统合的希望,就如同我们不能寄望天才建筑师凭着天分与感性可以创造人们的感知世界一样。□

图片来源:图1-3由谢英俊建筑师事务所提供;其余图片为作者自摄及自绘。

注释

- 1: 本文原为2010在中国杭州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所举办的“社会更新论坛”之讲稿,此为《新建筑》杂志所写的删简版。
- 2 这原是台湾罗东社区大学一堂纪录片课堂上的作业,后来得到台湾社区大学纪录片的评选优等。影片可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6ohptMGW0LA>。
- 3 这些讨论工业模组化的尝试与谢英俊开放系统的差别,可参考谢英俊在“中国新设计”系列70:人民的建筑——关系到70%人类居所的实践与探索展览的发言记录。
- 4 参见:<http://tedxtaipei.com/2011/10/on-returning-the-power/>。
- 5 例如台湾立法委员金素梅访视大社村的一段影片,其中批评谢的建筑用料不实,工法粗糙。参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LUUrPrwQL4>。

参考文献

- [1] Bachelard G, Jolas M.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1.
- [3]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4]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5.
- [5] Harvey D.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黄孙权. 绿色推土机——台北九零年代的违建、公园、自然房地产与制度化地景. 台北: 独立媒体, 2013.
- [7]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 [8] Tafuri M.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 [9]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0] Pred A.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1983, 13(1): 57-86.
- [11]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12] 柄谷行人. 作为建筑的隐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收稿日期 2013-10-23